

京津冀协同，推动张家口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

■ 魏苑 刘丽娇 刘楠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为区域文旅融合与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教育厅紧抓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将研学旅游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抓手与文教旅融合的核心载体，持续推动研学旅游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以研学赋能区域文旅产业升级与素质教育落地，让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成为京津冀研学协同发展的特色标杆。

研学旅游作为教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正成为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更是落实这些重要指示、激活京张地区发展活力的关键抓手。

发展优势与战略机遇

多元资源禀赋筑牢发展根基。张家口研学自然资源多样，坝上草原、小五台山、官厅水库等自然景观涵盖草原、山脉、湿地等多种地貌，为生态研学提供天然课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泥河湾遗址、涿鹿黄帝城、长城遗址、张库大道等载体，承载着中华文明起源与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是涵养文化自信的富矿；红色文化根基厚重，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首府所在地，是革命英雄董存瑞的故乡，也留下了李大钊的革命足迹，红色研学价值斐然；科创研学资源特色鲜明，领克汽车工厂和航空科技体验馆集研学、文旅、科普于一体，是京津冀科技研学的热门选择；冬奥遗产独一无二，“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场馆设施兼具科技感与文化内涵，冰雪研学独具特色；民俗古建资源丰富，鸡鸣驿古城、暖泉古镇保存完好，蔚县剪纸、康保二人台等非遗民俗独具魅力，为文化研学提供丰富素材。

区位优势打通联动脉络。张家口作为首都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地处京津冀、晋冀蒙三大经济圈与文化圈交汇枢纽，北接内蒙古草原、南邻京津冀核心城市，既

是华北与西北的衔接带，也是多元文化的交融地，具备跨区域研学主题延伸的天然条件。交通网络便捷高效，京张高铁实现1小时直达北京，“高铁+高速+航空”立体交通网络贯通全域，主要研学点位均紧邻交通干线，便于团队批量出行。

政策战略叠加强化发展支撑。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等战略深入推进，张家口政策支撑体系不断完善，《张家口市研学旅游发展规划（2026—2030）》《张家口市研学旅游基地（营地）建设指引（试行）》《张家口市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三个文件从规划布局、基地建设、质量提升等方面构建了全链条保障，为研学旅游发展保驾护航。

发展现状与挑战

当前，张家口研学旅游发展成效显著。一是市场活力持续迸发，2025年张家口市将研学旅游发展作为重点工作，全市共接待北京、天津、内蒙古、重庆、新疆和蒙古国、俄罗斯等域内外研学群体131.6万人次，同比增长229%。二是载体建设成果丰硕，推出了1个核心IP，凝练了12类研学主题，建设了63家研学旅游基地，26条精品研学线路。崇礼区建成完善的“冬奥+”“冰雪+”研学体系，多个核心点位成为研学旅游重要阵地。三是产品课程供给丰富，累计开发研学课程426套。四是服务保障体系规范，通过认证研学导师、推出专属保险等，构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

但张家口研学旅游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新的挑战。一是研学资源开发碎片化，整合不足，存在“重游轻研”现象。二是基地建设不规范，服务质量不均。三是专业人才短缺，协同机制不畅。四是品牌建设及推广薄弱，市场宣传覆盖不足。

关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第一，构建品牌引领的资源整合体系。强化规划统筹引领。依据全市研学旅

游发展规划，明确“两核驱动、三廊串联、十二大主题”的全域布局，推动各县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个性品牌；崇礼区聚焦冬奥冰雪研学，蔚县突出非遗研学，阳原县强化考古研学，张北县主打生态与脱贫攻坚研学，同时深耕民族融合与文化遗产研学，避免同质化竞争。

打造主题品牌线路。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为契机，打破地域壁垒，串联泥河湾遗址、黄帝城、长城、冬奥场馆、草原生态等核心资源，打造“文明溯源”“冬奥冰雪”“非遗传承”“绿色发展”“红色研学”等五大主题品牌线路，实现资源从“分散分布”到“集群发展”的转变。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搭建全市研学旅游云平台，整合基地、课程、导师等核心资源，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依托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已有成果，进一步深化跨区域协同，推动与京津、晋蒙等周边地区建立“资源互补、客源互送、标准共建”的联动机制，打造区域研学品牌走廊。

第二，推动夯实品牌根基的标准化建设。

严格基地建设标准。全面落实研学基地建设要求，从设施条件、课程设计、安全保障、人员配备等方面逐步规范。核心设施方面，确保基地瞬时承载力不低于100人，配备独立研学教室、主题展陈空间和适配规模的公共活动区域；配套设施方面，完善停车场、环卫、无障碍设施，实现通信信号与无线网络全覆盖，配备预约、管理、评价等数字化系统。

规范课程体系设计。构建“基础型（K12学生群体）+专题型（大学生及成人）+定制型（亲子研学、企业团建）”的三级课程体系，每个基地至少开发3门适配不同学段的主题课程，小学阶段课程时长不少于60分钟，初中不少于90分钟，高中不少于120分钟。强化课程与本地资源的深度绑定，将冬奥精神、长城文化、生态保护等核心元素融入课程设计，提升教育

价值。

筑牢全流程安全防线。建立“政府监管、机构主责、社会监督、家庭参与”的多元共治安全体系，配备完善的消防、应急救援、医疗等安全设施，监控设备实现全覆盖且影像保存15天以上。按“1比30”师生比配置持证安全员，导师须具备应急处理能力，定期开展针对地震、火灾、食品安全等场景的应急演练，为品牌建设筑牢安全根基。

第三，构建品牌升级的协同创新体系。强化人才队伍支撑。实施“研学人才培养计划”，鼓励张家口学院、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开设研学相关专业，培养研学指导师、课程开发师等专业人才。建立研学师资库，遴选优秀教师、导游、专家学者等参与研学指导，定期开展培训交流，到2030年实现研学旅游指导师达到500人。探索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实行持证上岗，提升专业服务水平。

推动业态创新融合。支持研学基地创新展陈方式，打造“远古遗迹+探源研究”“博物馆+VR技术还原”“算力基地+数字研学实验室”等新业态场景。深化“研学+”融合发展，推动研学与文旅、农业、工业、科技等产业深度融合，开发红色话剧巴士、非遗工坊体验、农耕科技实践等特色产品，丰富品牌内涵。

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行业自律、企业参与的协同机制，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研学旅游发展。发挥研学旅游协会作用，加强资源整合、标准制定与行业自律，推动形成“研学基地提供场地、教育机构开发课程、旅行社负责运营、文创企业设计衍生品”的产业链闭环。

第四，构建全域覆盖的品牌发展体系。确立品牌战略定位。将品牌塑造纳入全市研学旅游中长期发展战略，以“感悟时代精神游历大好河山”为品牌统领，提炼“长城脚下·研学张家口”核心品牌标

识，围绕“历史探源、生态科普、冰雪运动、红色传承”四大主题方向，细分“地质研学”“草原生态”“冬奥科技”“边塞文化”等子品牌矩阵，形成“一核引领、多极支撑”的品牌架构，增强市场对张家口研学产品的差异化认知，设计简约大气、辨识度高的品牌LOGO与吉祥物。明确品牌发展阶段目标：在2026年至2027年重点建设期，完成品牌形象塑造与基础传播；在2028年至2030年全面发展期，实现品牌叫响全国，成为全国一流研学旅游目的地品牌。

健全品牌评价体系。将基地标准化建设要求融入品牌评价，构建涵盖设施条件、课程质量、服务水平、安全保障、游客满意度等维度的品牌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研学旅游行业诚信建设“红黑榜”制度》，对优质基地给予品牌背书，对不达标基地限期整改或退出，确保品牌形象与服务品质深度绑定。

创新品牌推广路径。构建全媒体营销矩阵，重点打造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策划有特色、有主题的话题挑战赛，联动教育、旅游领域KOL/KOC共创内容。举办研学旅游创新发展大会、专题推介会等活动，制作高质量宣传片与宣传册，深化与旅行社、教育机构的合作。借鉴河北净菜、河北福嫂深耕京津核心市场，做亮省级公共品牌的成功模式，开展“研学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推广活动，拓展全国市场与境外市场。

强化品牌惠民属性。推动品牌向大众化、普惠化延伸，政府联合企业发放研学旅游消费券，在重要节假日举办促销活动，推出家庭套餐、团体套餐、淡季优惠等多样化产品。建立困难学生帮扶机制，确保研学普惠共享。鼓励基地开发适应不同群体的产品，满足中小學生、亲子家庭、银发群体、企业团建等多元需求，形成“高端引领、大众参与”的品牌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委党校）

贸易天下

下南洋与向南望：

历史记忆与当代中国—东南亚经贸合作

■ 潘玥

近来，电影《阿嬷的情书》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共鸣。透过阿嬷珍藏的一纸纸侨批，几代华侨家庭闯荡南洋、颠沛流离却又落地生根的集体记忆被缓缓唤醒。所谓下南洋，是指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数以百万计的闽粤劳工和小商人为生计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前往马来半岛、爪哇、婆罗洲、暹罗等地谋生。这是一段充满苦难与韧性的历史，也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最深沉的人文与经贸纽带。百年之后，纽带的形式已然改变，但人与人之间、市场与市场之间的连接从未断开。

相较于百年前，当代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全面建成；2022年1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正式启动；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将中国、东盟十国及其他成员国纳入同一制度框架。在数据层面，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3年双边贸易额突破6.4万亿元（约9117亿美元）。东盟则自2020年起超越欧盟，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这一格局的形成，既有地理毗邻与历史渊源的背景，更有产业互补与市场扩张的现实驱动。

如今，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转变。早期的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以资源换制成品为主，中国进口橡胶、棕榈油、锡矿，出口纺织品、日用消费品。进入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机电产品、中间品、零部件逐渐成为双边贸易的主体，这意味着两地经济关系从简单的商品互换升级为产业链层面的深度嵌套。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当前双边关系中最具活力、也最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冲击以及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影响，东南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显著提升。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吸引了大量产能转移，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种替代，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以越南为例，越南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国，2023年电子电气产品出口额超过1100亿美元。然而，越南本土配套能力有限，大量中间品依赖从中国进口。中越两国在电子、纺织、机械等领域形成了明显的垂直分工，中国供应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越南负责组装和成品出口。这一模式的实质是产业链延伸而非“断

链”。中国企业向越南转移的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终端环节，而将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品生产保留在国内，由此形成以中国为核心节点、向东南亚辐射的区域生产网络。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两国工业化程度较高，正积极承接中国在半导体封测、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产能合作。马来西亚槟城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集群，吸引了多家中国芯片封装企业入驻。泰国则依托东部经济走廊政策，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东南亚布局的重要目的地，比亚迪、哪吒、长城均已在当地建立或规划生产基地。

印尼的案例尤其具有战略意义。凭借丰富的镍矿资源，印尼与中国企业形成了从原矿冶炼到前驱体制造的合作链条，带动当地镍基新材料产业快速成长。苏拉威西岛的工业园区已集聚数十家中资企业，形成从资源开采到不锈钢、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的完整产业链。这一案例表明，中国与东南亚的产业合作已不再停留于简单的加工制造层面，而是向资源深加工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

在看到上述合作深度的同时，也需要正视若干现实制约。首先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仍存在较大缺口。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的建成通车是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突破，但东南亚整体陆路、港口及物流网络的碎片化状态尚未根本改变，部分内陆地区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产业链协作效率。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对中资的政策态度存在明显分化。一些国家出于对产业空洞化或资源依赖的顾虑，对中资进入特定领域设置了限制。这种分化本身并不意外，东南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各国的发展阶段、政治生态和对外经济战略差异显著，然而中国企业和相关机构对这种分化的研判和应对目前仍显不足。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企业的本地化经营能力。语言障碍、法律体系差异、劳工关系处理，以及与本地社区的融合程度，都直接影响项目落地质量。部分项目初期推进顺利，但因本地化程度不足，在后续运营中遭遇摩擦。这与历史上下南洋华侨的处境形成了某种对照。早期华侨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学习方言、与本地族群通婚、参与社区事务，由此积累了相当强的本地生存能力。今天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琼斯桥中央，矗立着一座饱含中式风韵的牌楼，牌楼上题“中国城”。这里就是始建于1594年的“比农多”，是全世界最早的海外华人聚居区之一。

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的中国企业拥有更雄厚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但在融入当地社会这一点上，更需多学习当年的先辈。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中国与东南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深化，有赖于若干基础性条件的持续改善。

在规则层面，RCEP的全面实施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和简化的海关程序有助于降低区域内多国生产布局的制度成本，推动供应链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但规则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也需要企业具备相应的跨境运营能力，目前两者之间仍存在落差。

在产业层面，新能源汽车、半导体、数

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正在重塑中国与东南亚产业链协作的内容和形态。这些领域的技术门槛较高，供应链较长，对双边合作的质量和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在这些领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利益，而非单向的产能输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双边经贸关系能否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深化的跃升。

一系列高端展会平台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供应链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即将于6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就是其中之一。这场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展会通过设置“六链一展区”，为包括以印尼

金光APP、泰国正大集团为代表的东南亚企业提供了与中国供应链伙伴合作的广阔机遇。

回看百年历史，经验表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经济联系从未因政治风向或外部压力而根本中断，其背后是地理、人口、产业结构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客观基础。百年前下南洋的那一代人选择了东南亚。今天，市场同样在用资本和订单作出选择。这种选择的逻辑，比任何政策宣示都更为持久。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兼印尼研究中心副主任）